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工作论文系列

No. SFIWP0041

“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

——来自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证据

郭峰 李欣

2014年12月23日

说明：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hanghai Finance Institute, SFI）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独立智库，致力于新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研究院成立于2011年7月14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hina Finance 40 Forum, CF40）举办，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战略合作。

本工作论文是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人员在工作期间形成的、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研究院。未经书面同意，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和复制。

“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¹

——来自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证据

郭峰^{1,2} 李欣³

(¹上海新金融研究院; 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³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Editorial Favoritism and Citation Discount

——Evidence From Top Chinese Economics Journals

FENG GUO^{1,2} XIN LI³

(¹Shanghai Finance Institute; ²Peking University;

³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摘要 经济学权威期刊规范化、公平化管理是中国经济学学术进步的重要保障。期刊编辑部如果偏爱某一机构和部分群体,可能会严重妨碍中国经济学的学术进步。本文通过对2001年至2012年12种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上发表的19000多篇学术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编辑部会偏爱该期刊隶属单位的研究人员,形成“关系稿”。同时,“关系稿”的引用率显著低于非“关系稿”,“关系稿”引用率贴水现象十分明显。但是,进一步的回归结果表明“关系稿”的贴水现象有所缓解,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规范化、公平化有所进步。

关键词 编辑部偏爱, 引用率贴水, 文献计量学

¹ 郭峰(通讯作者),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mail: guofengsfi@163.com, 电话: 021-33023255, 15121035928, 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280号7楼, 邮编: 200002。李欣,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E-mail: qingpingguo12@126.com。本文得益于与熊瑞祥、梁文泉、刘冲、汤毅等人的讨论, 特此致谢。本文曾在上海青年经济学者学术沙龙上报告, 感谢与会专家的评论。感谢匿名审稿人极具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编辑部偏爱与引用率贴水

——来自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证据

摘要 经济学期刊的规范化、公平化管理是中国经济学学术进步的重要保障,期刊编辑部如果偏爱某一机构和部分群体,可能会严重妨碍中国经济学的学术进步。本文通过对2001年至2012年12种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上发表的19000多篇学术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编辑部会偏爱该期刊隶属单位的研究人员,形成“关系稿”。同时,“关系稿”的引用率显著低于非“关系稿”,“关系稿”引用率贴水现象十分明显。但是,进一步的回归结果表明“关系稿”的贴水现象有所缓解,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规范化、公平化有所进步。

关键词 编辑部偏爱, 引用率贴水, 文献计量学

Editorial Favoritism and Citation Discount

——Evidence From Top Chinese Economics Journals

Abstract To enhance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economics in China,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manage the journals of economics impartially. Editorial favoritism towards some institutions and groups may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 of economics seriously.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more than 19000 articles published in 12 top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s from 2001 to 2012, we find that editorial departments of core economics journals prefer to articles written by authors in the same affiliated unit, which are called “connected articles”. We also find that the citation rate of “connected articles” is statistically lower than “unconnected articles”. However, more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 the reduction of citation discount of connected articles, which shows inch-by-inch progress of the economics journals in China.

Key Words Editorial Favoritism, Citation Discount, Bibliometric

JEL Classification A11, I24, Z1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显学。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取得较大进步,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人员在国际一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逐年增加(于晓华,2008),更表现在过去十余年中国本土经济学权威期刊质量也较快提升(王军,2010)。以《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中所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地使用数理方法等规范分析方法(成九雁和秦建华,2005),而且文章中明确进行稳健性检验的比例也大幅增强(张成思和陈曦,2014)。相对于林毅夫(1995)提出该命题之时,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已经有了很大进步。

显然,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质量的迅速提升与其越来越多地采用匿名审稿等规范化的管理有很大关系(刘瑞明和赵任杰,2014)。匿名审稿制度可以弥补编辑部成员在专业知识和信息方面的缺陷,经过同行专家把关和反复修改后的文章质量有所提高(Laband,1990;Hamermesh,1994)。而且,匿名审稿也有利于避免传统审稿制度中存在编辑部偏爱某一部

分群体而出现关系稿、人情稿等问题。然而，即便在匿名审稿制度下，期刊编辑部仍保留着对论文是否通过编辑部初审、如何安排匿名审稿人、接受后何时刊发、刊发时如何编排版面等的主导权（兰甲云，2009）。编辑部主导权的存在，使得人们常常议论编辑部是否可能会利用这些主导权而偏爱某一部分群体，使其获得相对于其他群体在论文刊发等方面的优势。理论上而言，编辑部的这一主导权既可以被用来主动寻找更好的论文，提高期刊影响力，也可能因为降低标准，录用人情稿，而使得期刊陷入内部人垄断。考虑到在期刊上发表论文事关研究人员的职称、报酬等，因此，研究编辑部偏爱现象及其后果对学术期刊的规范化管理和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果编辑部偏爱确实存在，那么某期刊发表的与该编辑部有关系的研究人员的论文和没有关系研究人员的论文，在质量上就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些质量上的差异就可能体现在引用率上。即如果编辑部偏爱的某一群体，那么该群体的论文和其他人的论文的引用率就可能存在系统差异。具体而言，如果这一偏爱编辑部主动寻找高质量论文（如名家之作），则这些论文的引用率可能更高，而如果这一偏爱编辑部在录用某一群体的论文时降低了审核标准，那么这一群体的论文引用率就可能更低。本文通过对2001-2012年《经济研究》等12种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上的逾19000篇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发表的该期刊隶属单位研究人员的论文引用率显著低于其他机构研究人员在该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的引用率，即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编辑部偏爱了其所属机构的研究人员。这便出现一种可以概括为“关系稿”的现象，且这些“关系稿”存在一定的引用率贴水（citation discount）。多个稳健性分析表明我们的这一发现非常稳健。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现象近年来已经有所缓解，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日益规范化得到了初步证实。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我们的样本和数据；第四部分是对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论文引用率和“关系稿”现象的一个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证实“关系稿”的确存在引用率贴水现象；第六部分是进一步分析，考察名校效应对“关系稿”贴水的影响，找出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日益规范化的证据，并探讨编辑部录用“关系稿”时是否存在寻找更好论文的动机；第七部分是简要结论。

二、文献综述

在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高质量论文是衡量一个研究人员创造力的最主要依据。研究人员论文发表情况直接关系到其是否能如期毕业、是否能获得教职以及是否能得到晋升等现实利益（Ellison，2010）。因此，经济学者们不仅努力撰写各自领域的学术论文，还对学术论文的发表过程、发表载体和发表机构等表现出了极大的研究兴趣。Stigler and Friedland（1975）以及Quandt（1976）都是早期有关经济学的文献计量学文献，而Liebowitz and Palmer（1984）、Stigler *et al.*（1995）以及Kalaitzidakis *et al.*（2003）等研究期刊质量和论文引用率的文献也得到了广泛引用。这些文献通过统计数据或计量经济手段对决定期刊或论文影响力的因素进行估算，揭示了学术期刊、学术论文的一些趋势。近期一些文献延续了这一传统，例如，Card and Della Vigna（2013）描述了英文经济学权威期刊的几大趋势，诸如投稿量越来越大、录用率越来越低、论文越来越长、合著现象越来越突出等。Hamermesh（2013）则发现英文经济学权威期刊中的纯理论论文和基于现成数据库的实证论文越来越少，而基于实验数据的实证论文则增加很多。

另一类文献应用微观经济分析，将经济学的经典模型运用到对论文写作、投稿以及审稿过程的研究中，让我们对这些影响期刊或论文质量的微观因素有了更多认识。这类文献尤为关注匿名审稿和期刊编辑部的作用。例如，既有文献认为匿名审稿制度可以提升论文质量（Laband，1990），也有文献认为匿名审稿制度可能不利于创新性方法的应用（Fölster，1995）。此外，还有关于编辑部如何选择审稿人（Hamermesh，1994）、双向匿名审稿和单向匿名审

稿的优劣 (Blank, 1991)、是否应向审稿人付费 (Engers and Gans, 1998)、审稿流程越来越长的影响 (Ellison, 2002; Leslie, 2005; Azar, 2005, 2007) 等方面的文献。

尽管施行了匿名审稿制度,但编辑部在决定论文发表等方面仍有一定的主导权。这种主导权的一个体现就是审稿速度,有些学者认为编辑部应该加快审稿过程,避免无谓损失 (Leslie, 2005);而其他部分学者则提出了相反观点,例如, Azar (2005, 2007) 认为如果编辑部审稿太快,特别是初审速度太快,就会吸引更多的低质量论文投稿,导致编辑部不堪重负。编辑部权力的另一个体现则是在对审稿人的自主选择上,虽然匿名审稿对一篇稿件是否能被接受有重大影响,但编辑部对审稿人的选择,可能就已经包含了其是否希望这篇稿子被接受的意愿,编辑部可能将其希望被接受的稿子交给那些倾向于相信某一理论的审稿人,例如,将涉及某概念的论文交给首提该概念的研究者来审稿,出于扩大自己学术影响力的考虑,审稿人可能会倾向于让该论文通过审稿。

此外,编辑部在论文发表方面的主导权体现更鲜明的是“编辑部偏爱”(editorial favoritism)现象,目前,很多文献都讨论了诸如期刊编辑部是否会系统性地偏爱某一团体或某类文章之类的问题。Gerrity and McKenzie (1978) 和 Laband (1985) 发现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PE) 更倾向于发表跟芝加哥大学有关系的学者(教师或曾经的学生)的论文。Wu (2007) 发现即便是近期, JPE 的这种偏爱依然明显。作为对这种行为的“辩护”, JPE 在1994年发表了 Laband and Piette (1994a) 的一篇开创性研究论文,他们基于1984年28个顶级英文经济学期刊上1051篇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期刊发表的那些跟主编、共同主编、责任编辑有“关系”的研究人员的论文引用率反而更高。他们认为期刊编辑部虽然可能偶尔会“偏爱”跟他们有关系的科研人员,降低录用标准,但总体而言,期刊编辑部发表更多有“关系”的研究人员的论文,是因为期刊编辑部在主动寻找更高质量的稿件过程中,对这些有“关系”的研究人员的论文更加熟悉,从而录用了这些科研人员更多,也更好的论文。

在 Laband and Piette (1994a) 开创性研究且得到让编辑部欣慰的结论之后,仍有一些经济学者继续考察了这一问题,但得到的结论仍多有利于编辑部(或者只有得到这样结论的论文才被编辑部接受发表了,这可能是另一个无法识别的“编辑部偏爱”问题)。例如, Medoff (2003) 基于与 Laband and Piette (1994a) 稍微不同的“关系稿”定义、样本期刊选择和回归方法设定,重新考察了编辑部偏爱某一群体对论文引用率的影响,仍然发现“关系稿”的引用率更高而不是更低。对“关系稿”的最新研究来自 Brogaard *et al.* (2014),他们基于30个经济学权威期刊超过50000篇文章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经济学期刊主编(共同主编)任期内,其所在研究机构的论文发表量比其他时期要高出100%,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关系稿”依然有更高的引用率。

当然,编辑部偏爱不仅仅表现在录用更多的“关系稿”, Laband *et al.* (2002)、Coelho *et al.* (2014) 也考察了另一种编辑部偏爱现象,即某期刊的编辑部可能会倾向于录用引用本期刊文献较多的论文,因为这可以提高本期刊的影响因子²。还有一种“编辑部偏爱”表现在编辑部对已接受论文的处理上,例如期刊编辑部在期刊排版时会照顾部分论文,比如将其放在“首篇论文”的位置,或者给予更好的版面 (Smart and Waldfogel, 1996; Coupé *et al.*, 2010)。

在国内关于经济学的文献计量学研究中,一般多是基于某个(类)期刊分析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领域等的演变(成九雁和秦建华, 2005; 王军, 2010; 张成思和陈曦, 2014)。此外,也有一些文献基于单个期刊,讨论该期刊在规范化方面取得的进步,如郇志坚(2010)、叶初升等(2010)和王军(2010)等。除刘瑞明和赵任杰(2014)外,鲜有文献对经济学期刊审稿过程进行细致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刘瑞明和赵任杰(2014)基于中国经济管理类366

² 当然,这一研究存在一个问题,也许并不是编辑部录用了引用本期刊更多文献的论文,而是在编辑部录用该文后,要求作者酌情从该期刊中多引用一些文献。

种期刊 2003-2012 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匿名审稿制度显著推动了中国经济管理类期刊的进步。尽管郇志坚（2010）、叶初升等（2010）等都注意到中国经济学期刊发表了更多其隶属单位研究人员的论文，但并没有对这些“关系稿”造成的影响进行严格检验。

三、变量与样本

（一）主要变量和识别策略

考察编辑部是否对某类群体存在系统性偏爱（歧视）及其影响，首要难题在于“关系稿”的认定。一般而言，期刊的审稿过程是不透明的，研究者无法知道期刊的具体审稿过程，也无法看到被拒绝的稿子，因此就无法评估被接受的论文和被拒绝的论文之间的差异，因此，编辑部是否对某类群体存在偏爱（歧视）很难有直接的度量指标。Laband and Piette（1994a）定义的“关系稿”为（1）作者之一是否在主编、共同主编、责任编辑之一所隶属（或获得博士学位）的高校获得博士学位；（2）作者之一是否隶属于主编、共同主编、责任编辑所隶属（或获得博士学位）的高校。但Medoff（2003）质疑了这种关于“关系稿”的定义，认为并非所有编辑部成员都拥有录用或者拒绝一篇稿子的权力，而认为只有主编、共同主编等才有这一权力。因此，Medoff（2003）将“关系稿”定义为：（1）作者之一是否在主编、共同主编参加的Seminar上报告过他们的论文；（2）作者之一是否和期刊主编或共同主编同时隶属一个学校；（3）作者之一是否隶属于主编、共同主编获得其博士学位的学校；（4）作者之一是否曾经是主编、共同主编所隶属学校的学生；（5）作者之一是否和主编或共同主编是同期研究生。不过，Brogaard *et al.*（2014）关于“关系稿”的定义更简略：某期刊现任主编、共同主编当前工作单位的研究人员在当期发表的论文³。参考这些文献的做法，并结合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大都有明确主办单位的现状，我们简单地将各个期刊发表本单位研究人员的论文界定为“关系稿”。

正如 Laband and Piette（1994a）、Medoff（2003）、Brogaard *et al.*（2014）所承认的，由于审稿过程的不透明性，无论如何界定“关系稿”，都会存在一定的偏误。如果“关系稿”的真实含义为论文作者与编辑部存在人际关系的论文，那么我们上述关于“关系稿”的可操作定义，即论文作者之一是否和该期刊隶属于同一单位，就存在正反两方面的“测量偏误”。第一，即便所有作者都不是该期刊隶属单位的研究人员，其仍可能与编辑部存在人际关系。正如 Laband and Piette（1994a）和 Medoff（2003）所述，作者和编辑可能有其他渠道的交集。第二，即便作者之一是该期刊隶属单位的研究人员，也不代表该研究人员就一定和编辑部有人际关系。如果研究机构规模很大，或者研究领域差异很大，作者和编辑部成员可能并不熟识。这两方面的测量误差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在实证结果部分会进一步分析。

显然，编辑部偏爱（歧视）是否存在，接受率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用接受率来判断是否存在编辑部偏爱（歧视）又过于粗糙。例如，我们可以预期好学校的研究人员水平比差学校研究人员水平高，从而其可能有更高的论文接受率。并且，由于审稿过程不透明，我们只能看到发表后的论文，没有接受发表的论文则无从知悉。此外，某期刊发表某机构和群体研究人员论文比例更高，也不代表该机构和群体的论文“接受率”就更高，也可能是该机构和群体投稿基数更大。因此现有文献均通过间接方式来识别编辑部偏爱的影响，即评估已发表论文的质量。如果编辑部偏爱确实存在，那么与编辑部有关系的论文和没有关系的论文，在质量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而言，如果编辑部偏爱某一群体，降低了对该群体论文录用的标准，那么这些论文的质量应该更低。但如果正如 Laband and Piette（1994a）、Medoff（2003）、Brogaard *et al.*（2014）等所论证的，编辑部偏爱录用某一群体的论文，是因为其对这些研究人员的论文更加熟悉，从而可以从中挑选出更好的论文，那么这些论文的

³ Brogaard *et al.*（2014）主要分析方法是比较某学校研究人员担任期刊主编的任期内是否接受了该学校比其他时期更多的论文。

质量可能就不会更低，反而会更高。

引用率是衡量一篇学术论文质量的最基础指标。引用率或者基于引用率编制的其他指标，往往被用来反映学者、研究机构、学术期刊的研究实力或影响力（Liebowitz and Palmer, 1984; Laband and Piette, 1994b; Costa Vieira, 2004; Hamermesh and Pfann, 2009; Ellison, 2010）。因此，虽然可能存在关于学术论文影响力的更严谨的评估方法（Palacios-Huerta and Volij, 2004; Hirsch, 2005; 赖平耀, 2011），但引用率仍是使用最为广泛的衡量期刊和论文影响力的简单指标。本文即以“被引次数”作为衡量一篇论文影响力的主要标准。同时，考虑到一篇论文所引用的文献仅占其所阅读文献的一部分，因此，为了反映那些被阅读但没有被引用的文献的价值，我们也以文献的“下载频次”作为论文影响力的另一个衡量指标（Coats, 2005, 2008; 马超, 2014）。

评估“关系稿”对论文质量的影响，一种简单的文献计量法是分别以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为被解释变量，以是否为“关系稿”为主要解释变量，以其他可能影响论文引用率和下载率的因素为控制变量，通过检验“关系稿”的系数是否显著为负，来考察其是否存在引用率贴水现象。计量方程如（1）式：

$$y_{jnik} = \alpha_1 \text{guanxi}_{jnik} + X'_{jnik} \beta + \varepsilon_{jnik} \quad (1)$$

虽然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混合面板数据，但仍可以通过不同的维度来更精确地界定一篇论文，如（1）式所列， j, n, i, k 分别代表了期刊、发表年份、期数、论文序列四个维度⁴。此外，（1）式当中， y 代表论文的引用次数（*citation*）或下载频次（*download*），*guanxi*代表主要解释变量“关系稿”，若论文为本单位研究人员所发，则*guanxi*为1，否则为0。 X 为影响论文影响力的其他因素， ε 为误差项。

除了是否“关系稿”之外，我们在回归中还考虑了以下控制变量：**（1）论文页数（page）**。当前，经济学的论文正在变得越来越长，以至于个别期刊出台政策限制论文长度（Card and Della Vigna, 2012）。部分学者认为，论文页数与引用率高低呈正相关关系（Costa Vieira, 2008; Ellison, 2011; Card and Della Vigna, 2013）。具体构造时，我们还通过对比不同期刊版面的大小，将论文页数统一调整为《经济研究》的标准。**（2）作者人数（aunum）**。现在论文合著的现象越来越突出，由于更多的合作者，可能意味着更多的知识贡献，因而有文献发现论文作者人数越多，论文的引用率就越高（Sauer, 1988; Costa Vieira, 2008）。**（3）是否首篇论文（leading）**。期刊的“首篇论文”（*leading paper*）往往会有更高的引用率，而哪篇论文会成为首篇论文则往往是编辑部精挑细选的结果。首篇论文更高的引用率是因为编辑部恰好挑选了更好的论文，还是仅仅因为首篇论文这个位置就可以导致更高的引用率，尚无公认结论。但 Coupé *et al.*（2010）基于一个“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首篇论文更高的引用率 2/3 可归因于其单纯作为“首篇论文”，而只有 1/3 可归因于其质量更高。**（4）是否年末论文（yrend）**。一些其他学术习惯也可能导致不同的论文出现意外的影响力差异。例如马超（2014）发现由于科研人员在检索文献时，往往从年初开始检索，从而导致年末发表的论文影响力小于年初。具体而言，我们设定月刊的当年最后 2 期为年末论文，双月刊和季刊的当年最后 1 期为年末论文。**（5）论文领域（class）**。我们的样本期刊基本上都是经济类综合性期刊，收录了不同领域的经济学论文，而不同的经济学学科领域的论文受关注程度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而论文引用率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为此我们通过中图分类号将样本论文划分为 9 个不同学科领域，即 F0 经济学，F1 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F2 经济计划与管理，F3 农业经济，F4 工业经济，F5 交通运输经济，F6 邮电经济，F7 贸易经济，F8 财政、金融，以及其他非经济学科。我们将不同学科设置为不同的虚拟变量，并以 F8 财

⁴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期数是标准化到 12 个月份的，即双月刊、季刊按其具体月份具体到月，如《经济学》（季刊）标准化为第 1、4、7、10 期。

政、金融学科为基准。(6) **发表时间长度(time)**。由于我们的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是某个时点前历史上所有引用和下载的累加,因此距离当前日期越早,单纯积累的引用量和下载量就越高。为了控制这一影响,我们在回归方程中还添加了论文发表日期距离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整理日期(2014年)的时间长度。

此外,为了更进一步控制不同期刊在不同年份发表的论文的引用率的差异,我们还控制了更为严格的“期刊*年份”交互项构造的固定效应⁵。期刊*年份固定效应的控制,实际上使得本文对不同论文引用率的比较可以精确到每个期刊每个年份。即我们比较的是某期刊某年份的所有论文中,“关系稿”和非“关系稿”的引用率是否存在系统差异。

(二) 样本来源说明

关于样本期刊的选择,我们选取了《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12种经济学类权威期刊作为样本期刊。样本期刊名录和隶属单位如表1所示。选择这些刊物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这些刊物呈现出的特点和风格较为接近,均为经济类综合性刊物,因而它们的可比性较强;第二,相对而言,这些刊物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较高水平,其发表的论文大都有较高的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且各论文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之间的变差(variation)较大,更适合于文献计量学分析;第三,这些期刊隶属单位较为明确,利于“关系稿”的认定。

表1 样本期刊和隶属单位

期刊	隶属单位	期刊	隶属单位	期刊	隶属单位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季刊	北京大学	经济科学	北京大学
金融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	世界经济文汇	复旦大学	经济评论	武汉大学
管理世界	国务院	财经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家	西南财经大学
世界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南开经济研究	南开大学

对于样本期间的界定,我们选择2001年年初至2012年年末,共计12年的跨度。这主要是考虑到如果离现时点太近,论文的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还不稳定,受不可观测因素影响较大。例如,根据Costa Vieira(2004)的分析,一篇论文发表后的前三年所获得的引用率大约仅相当于该文所能获得的总引用率的1/5,因此我们选择的样本截止期为2012年年末。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经济学进步很快,学者们可能已经不再关注和引用太过久远的文献。例如,根据Costa Vieira(2004)的研究,一般而言,一篇论文总引用率的2/3发生在该论文发表后的13年内。此外,时间太早时网络不如现在普及,更多的人选择阅读纸质文献,那么下载频次这个指标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我们的样本期限从2001年开始。

我们在中国知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上检索、整理了2001-2012年《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12种期刊能检索到的所有文章,然后剔除各类启事、广告、编委审稿人名单、纪要、诞辰、悼词、评奖、颁奖、目录、会议综述等非论文资料,剩余文献即为我们的分析总样本⁶。本文共包含12个期刊12年共计19056篇论文,其中,论文的“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数据来自《中国知网》,以2014年12月4日为检索日期,作者单位、文章页码等信息来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表2给出了常用的描述性统计。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P10	p25	p50	p75	P90
<i>citation</i>	19056	47.151	104.693	2.000	6.000	18.000	48.000	110.000
<i>download</i>	19056	1137.362	1343.614	203.000	384.000	755.000	1426.000	2473.000
<i>guanxi</i>	19056	0.199	0.399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部分方程中同时包含了存在共线性的时间趋势变量和“期刊*年份”虚拟变量,因此在回归中,会自动额外去掉一个虚拟变量。

⁶ 由于增刊的特殊性,我们的样本也剔除了增刊上的论文。

<i>page</i>	19056	9.009	4.461	3.354	5.671	8.279	11.740	14.300
<i>aunum</i>	19056	1.846	0.891	1.000	1.000	2.000	2.000	3.000
<i>leading</i>	19056	0.067	0.25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i>yrend</i>	19056	0.167	0.373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四、引用率和“关系稿”的直观统计

在使用计量方法分析“关系稿”对论文引用率的影响之前，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我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一些基本趋势，以求得到一些直观感知。从图1中可以看出，这12种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总载文量有逐年下降的趋势⁷。在总载文量逐渐下降的同时，如同英文经济学权威期刊的趋势一样，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长，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深度在持续增加，不求数量，追求质量。具体而言，如图2所示，平均每篇论文的页数已经由2001年的6.2页增加到了2012年的1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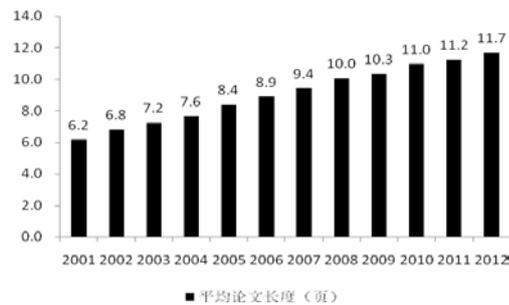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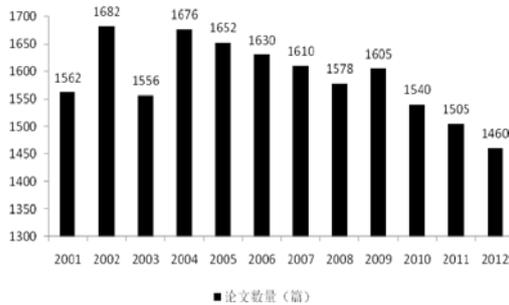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权威经济学期刊载文量

图2 中国权威经济学期刊平均论文长度

不仅论文的页数在增加，每篇论文的作者人数也在逐渐增加，论文合作已经成为普通现象。随着现代科学不断向纵深发展，研究的难度也不断加大，传统的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的分散研究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研究形势，合作成为当代科研活动最基本、最常见和最主要的形式。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中合作论文比例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001年，合著比例仅为38.7%，但2012年该比例已上升至76.9%。相应地，平均每篇论文的作者人数则由2001年的1.6人增加到2012年的2.2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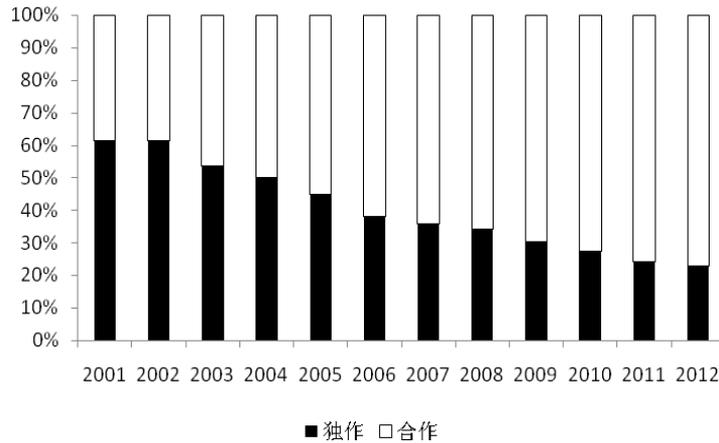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权威经济学期刊合著趋势

现在我们来考察中国权威经济学期刊所刊载论文的引用率趋势。虽然我们笼统地将本文所收录的所有期刊称为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但实际上这些期刊的影响力存在很大差异。如图4

⁷ 2004年之前数据不稳定，是因为部分期刊在这段时间内进行了陆续改版。2009年总载文量的上升，是因为《经济学家》改版，增加了载文量。

所示，在2014年年末，2001-2012年间《经济研究》发表的所有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151次，显著高于其他期刊，是排名第二的《中国工业经济》平均引用次数的3倍左右。其他期刊虽然在被引次数上也存在一些差异，但梯度变化相对较小。

我们的引用率数据整理自某个时点，为该论文自发表后到数据整理日期累计的所有引用率，因此，论文发表时间距离数据整理日期的远近不同，论文的引用率也会不同。如图 5 所示，论文发表时间距离数据整理日期越近，平均引用率呈现先上升后迅速下降的趋势。上升阶段既可能是因为论文发表时间太久远，超过了现在文献的关注范围，也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学学术论文质量快速上升。而论文引用率快速下降阶段，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些论文的引用率尚在积累中，还不稳定。

此外，从图 4 和图 5 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论文的引用率均值和中位值始终存在较大的差距，并且中位值大大低于均值，这说明论文的引用率分布是严重正偏分布。大部分论文的引用率都较低，而少数明星论文则获得了较高的引用率，从而拉高了平均引用率。具体而言，在 19056 篇论文总量中，大约 609 篇论文从没有被引用过，占全部论文的 3.2%。当然，有些论文尚未被引用过，可能是因为发表时间太短，其价值还没得到体现，例如 2012 年的论文中就有 156 篇论文尚未被引用。在高引用率的明星论文当中，林毅夫和李永军发表于《经济研究》2001 年第 1 期上的论文《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获得了最高的引用率—4202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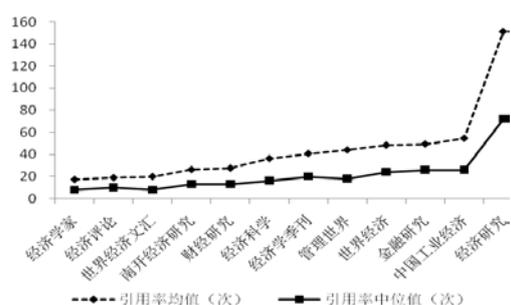


图 4 不同期刊的论文引用率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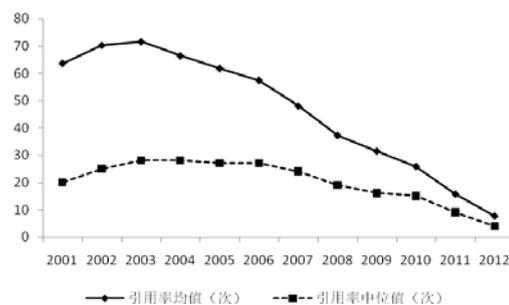


图 5 不同年份的引用率差异

现在我们来考察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中的“关系稿”现象。从图 6 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学权威期刊发表其所隶属单位研究人员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非常高。例如，对《南开经济研究》或《世界经济文汇》而言，来自该期刊隶属单位南开大学或复旦大学的论文均超过 40%，其他期刊的“关系稿”现象也非常严重。形成对比的是，根据 Brogaard *et al.* (2014) 对 30 种英文经济学期刊的统计，在超过 50000 篇论文的样本中，作者跟主编（共同主编）隶属同一所高校的比例为 7%。而在 Medoff (2003) 所考察的 1990 年美国六大期刊 359 篇文章当中⁸，根据更宽泛的“关系稿”界定标准，“关系稿”比例也仅占 6%。这说明英文经济学期刊相对更加独立，而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深受其所隶属单位的垄断，成为本单位研究人员的自留地。

上述各个期刊“关系稿”的比例是 2001-2012 年全部论文的平均，如果看历年的“关系稿”比例，我们倒是可以得到一些令人欣慰的观察：“关系稿”比例近年来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如图 7 所示，在全部期刊当中，“关系稿”的比例由 2001 年的 34.8%，下降到 2012 年的 13.1%。这一简单趋势可以初步表明我国经济学权威期刊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

⁸ 六大期刊指的是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Econometric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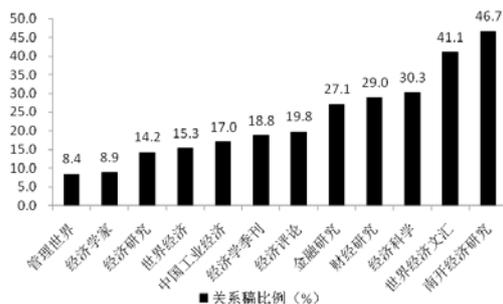


图6 不同期刊的关系稿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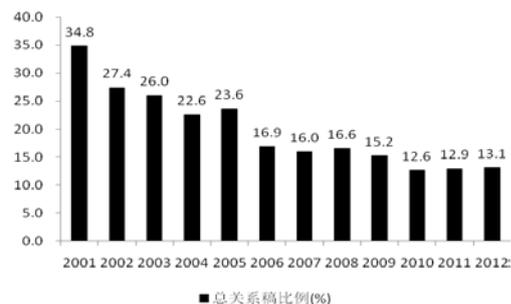


图7 不同年份的关系稿比例

关于“关系稿”对论文引用率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表3得到一些初步的分析。从“关系稿”和非“关系稿”的分类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关系稿”的平均被引次数为42.1次，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低于非“关系稿”的48.4次。而“关系稿”的下载频次也显著低于非“关系稿”。借鉴经济学的术语，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关系稿”存在一定的“引用率贴水”现象。当然，如果要得到更可靠的证据，还需要更严格的文献计量学分析。除引用率和下载率之外，“关系稿”和非“关系稿”差异也比较明显。

表3 “关系稿”和非“关系稿”的直观差异

变量	非关系稿 N=15261	关系稿 N=3795	差异
<i>citation</i>	48.418 (110.5625)	42.054 (76.116)	-6.364*** (1.899)
<i>download</i>	1197.501 (1405.536)	895.523 (1023.729)	-301.978*** (24.274)
<i>page</i>	9.191 (4.555)	8.276 (3.978)	-0.915** (0.081)
<i>aunum</i>	1.836 (0.838)	1.888 (1.079)	0.052*** (0.016)
<i>leading</i>	0.057 (0.231)	0.110 (0.313)	0.053*** (0.005)
<i>yrend</i>	0.165 (0.371)	0.173 (0.3779)	0.008 (0.007)

注：①()内数值为标准差，②*、**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五、实证结果

(一) 基本回归结果

本部分，我们考察是否为“关系稿”对论文引用率的影响。根据上文的分析，引用率为非负整数，且分布右偏，因此为了缓解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对引用率取对数。这样损失了引用次数为0的样本共计609个，占全样本的3.2%。下文我们将包含这些样本的回归作为稳健性分析。此外，考虑到同一期刊某一年份的论文会受到编辑部工作习惯、期刊数据库调整等共同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报告了经由“期刊*年份”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表4 基本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8)
引用	引用	引用	引用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

<i>guanxi</i>	-0.0800*	-0.244***	-0.214***	-0.155***	-0.315***	-0.204***	-0.175***	-0.0841***
	(0.048)	(0.038)	(0.038)	(0.033)	(0.047)	(0.033)	(0.032)	(0.022)
<i>page</i>		0.0886***	0.0883***	0.0870***		0.0717***	0.0708***	0.0516***
		(0.009)	(0.008)	(0.007)		(0.007)	(0.007)	(0.004)
<i>aunum</i>		0.120***	0.121***	0.0637***		0.128***	0.128***	0.0621***
		(0.022)	(0.020)	(0.018)		(0.015)	(0.013)	(0.011)
<i>leading</i>		0.156***	0.155***	0.0666		0.0295	0.0295	-0.00193
		(0.043)	(0.042)	(0.041)		(0.034)	(0.032)	(0.032)
<i>yrend</i>		-0.193***	-0.195***	-0.188***		-0.0760***	-0.0754***	-0.0720***
		(0.030)	(0.030)	(0.030)		(0.020)	(0.020)	(0.020)
<i>time</i>		0.169***	0.183***	0.235***		-0.0395***	-0.0391**	0.0321***
		(0.015)	(0.020)	(0.004)		(0.014)	(0.019)	(0.002)
年份	不含	不含	含	不含	不含	不含	含	不含
期刊*年份	不含	不含	不含	含	不含	不含	不含	含
<i>N</i>	18447	18447	18447	18447	19056	19056	19056	19056
调整 <i>R</i> ²	0.000473	0.181	0.219	0.337	0.0165	0.239	0.296	0.504

注：①()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聚类稳健标准误，②*、**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③由于被解释变量学科领域的虚拟变量太多，表格中未进行汇报。下同。

首先我们看简单的二元回归。表4第（1）列显示，“关系稿”的系数为负，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与国外关于“关系稿”的引用率反而更高的结论不同，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上的“关系稿”存在明显的引用率贴水现象。但表4第（1）列回归结果的调整*R*²说明，这一回归整体解释能力很差，因此，我们在表4第（2）列中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此时“关系稿”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且系数的绝对值更大，说明剔除其他间接效应之后，“关系稿”对引用率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此时调整*R*²的值表明回归方程的解释能力有所上升。

为了进一步提高方程的解释力，我们还要进一步控制其他因素。例如，我们是在某一个时点上统计某篇论文的全部历史引用率，因此发表时间越早的论文，单纯时间积累的引用率可能就越高，故而可以控制比发表时间长度更严格的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年份时间效应的表4第（3）列的调整*R*²显示，方程的解释能力进一步提升，这表明控制年份固定效应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在本文的设置中，我们还可以控制比时间效应更严格的期刊固定效应和年度时间效应的交互项，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允许不同年份的引用率有系统性的差异，而且不同期刊的影响力也可以存在一定的差异，更加重要的是，这种交互项固定效应允许这些期刊影响力之间的差异可以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这显然与中国不同经济学权威期刊影响力此消彼长的现实相吻合。表4第（4）列给出了此时的回归结果，调整*R*²为0.337。该回归结果显示，“关系稿”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具体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相对于非“关系稿”，“关系稿”的被引次数平均约低15.5%，可见“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幅度之高。下文中我们均以表4第（4）列回归作为基准回归。

表4第（5）-（8）列是以下载频次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和引用率回归一致，在增加控制变量后，方程的解释力逐渐提升。表5第（8）回归结果显示，“关系稿”的被下载次数比非“关系稿”平均约低8.4%。对比表4第（4）和第（8）列的回归结果，似乎可以得到结论：“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程度比下载率贴水程度更高。人们在下载一篇论文之前，往往只关注其所发表的载体和研究内容，而是否将其列入参考文献，则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阅读，来判断其学术价值是否值得引用。从而“关系稿”引用率贴水程度高于下载率贴水程度，也就进一步佐证了我们关于关系稿存在引用率贴水现象的结论。

关于控制变量，我们可以发现，论文越长、作者人数越多，引用率就会越高，而年末论

文则遭遇“影响力陷阱”，这些与现有文献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同时，在排除了其他影响，特别是“关系稿”的影响后，是否首篇论文对引用率和下载率已经没有显著影响。从论文领域来看，相对于“F8财政、金融”领域，“F0经济学”、“F7贸易经济”领域的论文引用率显著更低；而出乎意料的是“F3农业经济”和“F4工业经济”领域的论文应用率显著高于“F8财政、金融”领域的论文，其他领域论文与“F8财政、金融”差异不大。但是，差异不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某些领域的论文样本量太小，从而统计误差较大，结果不稳健。例如“F6邮电经济”领域论文样本量仅有71篇。因此，对不同学科领域的论文的影响力差异，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这里我们讨论一下我们对“关系稿”的定义对“关系稿”贴水幅度的估计结果的影响。根据上文的分析，第一，如果我们关于“关系稿”的定义过窄，例如，部分非本单位研究人员也通过人情关系在本期刊上发表论文，但我们将其视为非“关系稿”，那么这一偏误会导致我们关于“关系稿”引用率贴水幅度的低估。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一结果，我们可以简化分析如下：假如只有三篇论文，“关系稿”1，引用率50；“关系稿”2，引用率50；非“关系稿”，引用率100。显然，“关系稿”的真实引用率贴水幅度为50，但我们错把“关系稿”2视为非“关系稿”，此时估计的“关系稿”引用率贴水幅度仅为 $25 \left((100+50) / 2 - 50 \right)$ ，即低估了“关系稿”引用率贴水程度。第二，如果我们关于“关系稿”的定义过宽，例如，本单位规模庞大，部分研究人员并没有和编辑部的人际关系，我们却将其发表在该期刊上的论文视为“关系稿”。那么这一偏误也会导致我们关于“关系稿”引用率贴水幅度的低估。仍如上文：假如只有三篇论文，“关系稿”1，引用率50；非“关系稿”1，引用率100；非“关系稿”2，引用率100。显然，“关系稿”的真实引用率贴水幅度仍为50，但我们错把非“关系稿”1视为“关系稿”，此时估计的“关系稿”引用率贴水幅度仅为 $25 \left(100 - (100+50) / 2 \right)$ ，即低估了“关系稿”的真实引用率贴水程度⁹。

（二）稳健性回归

本部分，我们对上述基本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首先，由于我们对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取对数，以求缓解极端值的影响。这样在被解释变量为引用率的回归中，我们就损失了占全样本3.2%的零引用率论文，为了检验排除零引用率对我们结果的影响。我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全样本回归，一是直接对引用率水平值进行回归，二是对所有被引次数加0.1，再取对数。表5（1）-（2）给出了此时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关系稿”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表5（5）的回归显示，对下载频次水平值的回归也显著为负。这说明我们对被解释变量取对数是适宜的。具体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相对于非“关系稿”，“关系稿”的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分别低8.4次和106.8次，考虑到论文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的均值分别为47次和1139次，以此计算，“关系稿”的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要比非“关系稿”低17.9%和9.38%，因此对被解释变量取对数估计出的贴水幅度略低于使用水平值得到的估计结果，但基本一致。

另一个稳健性分析是要排除异常值的影响。考虑到少数明星论文对论文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均值的拉高会导致其严重右偏，我们在表5第（3）和第（6）列给出了将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最高的5%论文剔除后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此时“关系稿”的系数绝对值虽然稍有下降，但仍然非常显著。另一种剔除异常值的方法为剔除那些篇幅过短的论文。具体而言，表5第（4）、（7）列给出了剔除页数小于等于2页的论文之后的回归结果。此时的回归结果显示，“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和下载率贴水仍然非常显著，甚至贴水程度更大。

表5 稳健性回归结果

⁹ 当然，我们这里关于“关系稿”认定的不同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是建立在我们假定“关系稿”存在引用率贴水现象的基础上的。如果如 Laband and Piette（1994a）等人得出的“关系稿”引用率更高，那么“关系稿”的不同认定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就另当别论。

	(1)	(2)	(3)	(4)	(5)	(6)	(7)
	引用 非对数	引用 含零引用	引用 去高引用	引用 去短论文	下载 非对数	下载 去高下载	下载 去短论文
<i>guanxi</i>	-8.422 ^{***} (2.136)	-0.182 ^{***} (0.038)	-0.137 ^{***} (0.030)	-0.162 ^{***} (0.033)	-106.8 ^{***} (26.386)	-0.0717 ^{***} (0.021)	-0.0865 ^{***} (0.023)
<i>page</i>	3.250 ^{***} (0.520)	0.102 ^{***} (0.008)	0.0783 ^{***} (0.006)	0.0691 ^{***} (0.006)	64.66 ^{***} (5.833)	0.0446 ^{***} (0.004)	0.0475 ^{***} (0.004)
<i>aunum</i>	4.538 ^{***} (1.395)	0.0836 ^{***} (0.020)	0.0445 ^{***} (0.016)	0.0599 ^{***} (0.019)	73.27 ^{***} (15.219)	0.0546 ^{***} (0.010)	0.0608 ^{***} (0.011)
<i>leading</i>	10.44 ^{**} (4.057)	0.0248 (0.052)	0.0103 (0.037)	0.0659 (0.043)	106.5 [*] (53.980)	-0.0331 (0.030)	-0.00390 (0.032)
<i>yrend</i>	-8.734 ^{***} (2.201)	-0.226 ^{***} (0.034)	-0.163 ^{***} (0.028)	-0.191 ^{***} (0.030)	-109.6 ^{***} (33.432)	-0.0616 ^{***} (0.018)	-0.0743 ^{***} (0.019)
<i>time</i>	6.112 ^{***} (0.359)	0.308 ^{***} (0.005)	0.223 ^{***} (0.003)	0.270 ^{***} (0.003)	50.32 ^{***} (3.644)	0.0274 ^{***} (0.002)	0.0343 ^{***} (0.002)
期刊*年份	含	含	含	含	含	含	含
<i>N</i>	19056	19056	17495	17297	19056	18109	17757
调整R ²	0.211	0.322	0.284	0.327	0.334	0.466	0.496

(三) 分位数回归

上文采用的OLS回归，估计结果实际为是否“关系稿”对论文引用率的平均影响，然而由于论文影响力差异较大，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因此是否“关系稿”对不同层级的论文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虽然我们在上文对被引次数和下载频率取对数，部分缓解了极端值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使用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进一步考虑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有偏分布的影响。理论上，OLS回归是拟合被解释变量的条件均值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而分位数回归是通过估计被解释变量在0-1之间的不同分位数值，对特定分布的数据进行估计。另外，OLS估计式是衡量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果，而分位数回归估计式则是考察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某个特定分位数的边际效果。

表6和表7分别报告了以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时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我们分别在10%、25%、50%、75%和90%的分位数上进行回归。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分位数论文当中，“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幅度明显小于低分位数论文，甚至在高分位数论文当中，“关系稿”的下载频次和非“关系稿”已经没有明显差异。如果一篇论文能够成为高影响力论文，则是否为本单位的“关系稿”已经影响不大，但对于那些刚刚达到发表门槛的普通论文，是否为本单位的“关系稿”则影响甚大。该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一个期刊对本单位研究人员降低录用标准，那么“关系稿”贴水现象显然主要集中在低水平论文当中。

表6 被引次数对数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1)	(2)	(3)	(4)	(5)
	quartile10	quartile25	quartile50	quartile75	quartile90
<i>guanxi</i>	-0.286 ^{***} (0.037)	-0.176 ^{***} (0.031)	-0.140 ^{***} (0.027)	-0.0634 ^{**} (0.032)	-0.0642 ^{**} (0.032)
<i>page</i>	0.0822 ^{***} (0.005)	0.0907 ^{***} (0.004)	0.0869 ^{***} (0.003)	0.0884 ^{***} (0.003)	0.0817 ^{***} (0.003)
<i>aunum</i>	0.0330 [*] (0.019)	0.0818 ^{***} (0.015)	0.0874 ^{***} (0.012)	0.0890 ^{***} (0.013)	0.0946 ^{***} (0.013)

<i>leading</i>	0.0906 (0.057)	0.0290 (0.047)	0.0844** (0.040)	0.0885* (0.048)	0.0598 (0.048)
<i>yrend</i>	-0.172*** (0.038)	-0.204*** (0.031)	-0.219*** (0.027)	-0.197*** (0.032)	-0.219*** (0.032)
<i>time</i>	0.184*** (0.041)	0.284*** (0.035)	0.260*** (0.030)	0.266*** (0.036)	0.331*** (0.035)
期刊*年份	含	含	含	含	含
<i>N</i>	18447	18447	18447	18447	18447
<i>Pseudo-R</i> ²	0.1525	0.1818	0.2050	0.2237	0.2437

表7 下载频次对数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1) quartile10	(2) quartile25	(3) quartile50	(4) quartile75	(5) quartile90
<i>guanxi</i>	-0.188*** (0.021)	-0.134*** (0.018)	-0.0866*** (0.016)	-0.0223 (0.018)	-0.00686 (0.023)
<i>page</i>	0.0416*** (0.003)	0.0485*** (0.002)	0.0508*** (0.002)	0.0526*** (0.002)	0.0550*** (0.002)
<i>aunum</i>	0.0610*** (0.011)	0.0684*** (0.009)	0.0638*** (0.007)	0.0782*** (0.007)	0.0542*** (0.010)
<i>leading</i>	-0.0286 (0.031)	-0.0168 (0.027)	0.00828 (0.025)	0.0514* (0.027)	0.0457 (0.035)
<i>yrend</i>	-0.0948*** (0.021)	-0.0794*** (0.018)	-0.0740*** (0.016)	-0.107*** (0.018)	-0.117*** (0.023)
<i>time</i>	-0.0636*** (0.021)	0.0157 (0.019)	0.0360** (0.017)	0.0553*** (0.019)	0.0717*** (0.023)
期刊*年份	含	含	含	含	含
<i>N</i>	19056	19056	19056	19056	19056
<i>Pseudo-R</i> ²	0.3748	0.3391	0.3049	0.2784	0.2645

(四) 考虑“期刊*年份*期数”固定效应¹⁰

根据我们回归方程(1)式的设置,我们在四个维度上定义了一篇文章,即期刊、年份、期数和论文序列。上文的基准回归中我们控制了“期刊*年份”两个维度上的固定效应,也控制了期数上的代表——“年末论文”,以及论文序列上的代表——“首篇论文”。不过,由于本文的数据量较大,自由度较大,因此还可以在更严格的层次上进行固定效应的设置,即“期刊*年份*期数”固定效应。这样定义之后,虽然我们使用的不是面板数据,但却可以当成面板数据来处理。此时,期刊*年份*期数决定了面板的第一个维度,论文序列决定了面板的第二个维度,这样定义面板后,便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而这就相当于增加了“期刊*年份*期数”虚拟变量。此时的回归结果显示关系稿的引用率和下载率贴水幅度的估计结果均较上文的基准回归差异不大,我们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8 考虑更严格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

	(1) 引用	(2) 下载
<i>guanxi</i>	-0.133***	-0.0688***

¹⁰ 此处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0.035)	(0.023)
<i>page</i>	0.0877***	0.0514***
	(0.007)	(0.004)
<i>aunum</i>	0.0591***	0.0599***
	(0.019)	(0.011)
<i>leading</i>	0.0586	-0.00752
	(0.042)	(0.032)
<i>yrend</i>	-2.240***	-0.555***
	(0.029)	(0.017)
<i>time</i>	0.321***	-0.0731***
	(0.005)	(0.002)
期刊*年份*期数	含	含
<i>N</i>	18447	19056
调整R ²	0.366	0.529

（五）反事实检验

为了检验“关系稿”对论文引用率和下载率的影响，我们还可以用一个反事实推断的方法来反证。我们将与本单位研究实力相当的其他单位在本单位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视为“伪关系稿”。如果这种“伪关系稿”也表现出了引用率贴水或下载率贴水的证据，则说明上述“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结论并不可靠，而是其他未观测因素导致的系统性偏误。

具体而言，对于研究实力相近的单位，我们通过对本单位和其他单位在本单位期刊之外的其他样本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数量来衡量。例如，对于上海财经大学，我们发现在《财经研究》之外的11种样本期刊中，浙江大学的论文发表数和上海财经大学较为接近，从而将浙江大学在《财经研究》上发表的论文视为“伪关系稿”。“伪关系稿”单位具体设置如表9所示。此时“伪关系稿”的比例仅为2.3%，显著低于真正“关系稿”19.9%的比例。表10的回归结果显示，“伪关系稿”没有任何引用率贴水或下载率贴水现象。这反证了我们上述结论的可靠性。

表9 “伪关系稿”对应单位

样本期刊	原单位	刊文数	伪关系单位	刊文数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383	中山大学	395
金融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	170	华南师范大学	122
管理世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73	辽宁大学	80
世界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	383	中山大学	395
经济学季刊	北京大学	922	中国人民大学	919
世界经济文汇	复旦大学	759	南开大学	776
财经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448	浙江大学	495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	383	中山大学	395
经济科学	北京大学	922	中国人民大学	919
经济评论	武汉大学	377	西安交通大学	352
经济学家	西南财经大学	322	西安交通大学	316
南开经济研究	南开大学	776	复旦大学	759

注：这里的刊文量是指本单位研究人员在本单位期刊之外的其他样本期刊的刊文数。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匹配时，则同时剔除了《世界经济文汇》和《南开经济研究》。

表10 反事实推断的回归结果

	(1)	(2)	(3)	(4)
	引用	引用	下载	下载
<i>guanxi_false</i>	0.159** (0.069)	0.0777 (0.054)	0.0586 (0.057)	0.0847** (0.034)
<i>page</i>	0.0896*** (0.009)	0.0869*** (0.007)	0.0725*** (0.008)	0.0515*** (0.004)
<i>aunum</i>	0.111*** (0.023)	0.0586*** (0.019)	0.121*** (0.016)	0.0589*** (0.011)
<i>leading</i>	0.124*** (0.043)	0.0491 (0.041)	0.00173 (0.035)	-0.0112 (0.032)
<i>yrend</i>	-0.195*** (0.030)	-0.188*** (0.030)	-0.0777*** (0.021)	-0.0727*** (0.020)
<i>time</i>	0.165*** (0.015)	0.231*** (0.003)	-0.0431*** (0.014)	0.0289*** (0.002)
期刊*年份	不含	含	不含	含
<i>N</i>	18447	18447	19056	19056
调整R ²	0.177	0.336	0.232	0.503

六、进一步讨论

(一) 名校效应对“关系稿”贴水现象的影响

一名研究人员在引用文献时，显然会更倾向于引用同单位的研究人员的文章，而简单的统计可以发现本文样本期刊录用的其隶属单位论文的比例在所有单位中均排名第一，而且这些单位基本上都是中国经济学的重镇。同时由于样本期刊设置的原因，这些知名研究单位在本单位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倾向也会更高。因此本文上述基本回归结果同时存在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而且，对具体影响方向而言，由于没有考虑到“名校效应”对上述基本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上文关于“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的估计可能还存在低估。

为了验证这一推论，也进一步缓解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本部分进一步控制作者单位的影响。首先，我们通过作者第一单位将所有期刊的所属单位标准化，并删除那些在所有样本期刊所有年份中发表论文数少于 50 篇的普通单位，仅留下发表论文较多的知名单位。这样处理后剩余的单位共计 53 个，所剩的论文数占全样本的 78.1%。表 11 第(1)列和(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此时“关系稿”仍存在明显的引用率和下载率贴水现象，并且仅在知名学校之间比较时，“关系稿”的引用率和下载率贴水幅度更高，这佐证了我们之前的分析。我们在表 11 第(2)列和第(4)列中进一步增加了“学校*年份”的固定效应，此时的回归结果和表 11 第(1)和(3)列的结果相差无几，这说明在剔除普通学校之后，进一步控制学校效应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已经不大。

表11 仅包含重点研究单位后的子样本回归结果

	(1)	(2)	(3)	(4)
	引用	引用	下载	下载
<i>guanxi</i>	-0.221*** (0.036)	-0.219*** (0.035)	-0.134*** (0.024)	-0.134*** (0.023)
<i>page</i>	0.0839*** (0.006)	0.0838*** (0.006)	0.0501*** (0.003)	0.0499*** (0.003)
<i>aunum</i>	0.0611*** (0.022)	0.0588*** (0.022)	0.0599*** (0.013)	0.0589*** (0.013)

<i>leading</i>	0.152 ^{***} (0.040)	0.154 ^{***} (0.041)	0.0642 ^{**} (0.030)	0.0674 ^{**} (0.030)
<i>yrend</i>	-0.207 ^{***} (0.031)	-0.206 ^{***} (0.031)	-0.0909 ^{***} (0.020)	-0.0892 ^{***} (0.020)
<i>time</i>	0.242 ^{***} (0.002)	0.273 ^{***} (0.011)	0.108 ^{***} (0.001)	0.0449 ^{***} (0.009)
期刊*年份	含	含	含	含
学校*年份	不含	含	不含	含
<i>N</i>	14483	14483	14886	14886
调整R ²	0.340	0.341	0.500	0.501

(二) 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日益规范化的证据

在上文的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中的“关系稿”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这初步表明经济学期刊正在逐渐走向规范化。那么，经济学期刊的这种规范化趋势能否在“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幅度上有所体现呢？本部分重点分析这一问题，这也是考察在经济学各界多年努力下，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在规范化管理方面取得何种进步。

为此，我们将 2001-2012 年拆分成三等份，进行分样本回归。表 12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 2001-2004 年阶段，“关系稿”的引用率和下载率贴水幅度非常大，“关系稿”较非“关系稿”被引次数贴水 22.4%，下载频次贴水 11.7%。在 2005-2008 年，“关系稿”虽然仍有显著的贴水现象，但贴水幅度已经显著低于 2001-2004 年。而在 2009-2012 年，“关系稿”的引用率和下载率贴水现象已经不再显著。

同时，考虑到分样本回归时，系数之间的差别不好简单比较，因此在表 12 第（4）列和第（8）列，我们也通过引入时间交互项，对比分析早期“关系稿”论文引用率和下载率贴水幅度和晚期“关系稿”论文引用率和下载率贴水幅度。回归结果和分样本回归结论基本一致，2009-2012 年的“关系稿”贴水幅度较基准期 2001-2004 年显著下降。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规范化得到了初步证实。当然，考虑到距离统计时点太近时，论文的引用率可能会存在很大误差（Costa Vieira, 2004），因此，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逐步走向规范化的结论是否真正成立，尚有待历史的检验。

表12 分阶段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8)
	引用	引用	引用	引用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
	2001-2004	2005-2008	2009-2012	2001-2012	2001-2004	2005-2008	2009-2012	2001-2012
<i>guanxi</i>	-0.224 ^{***} (0.046)	-0.145 ^{**} (0.071)	-0.0398 (0.034)	-0.231 ^{***} (0.046)	-0.117 ^{***} (0.038)	-0.0829 ^{**} (0.039)	-0.0275 (0.026)	-0.119 ^{***} (0.039)
<i>guanxi*year0508</i>				0.0900 (0.085)				0.0356 (0.056)
<i>guanxi*year0912</i>				0.190 ^{***} (0.058)				0.0911 [*] (0.049)
<i>page</i>	0.129 ^{***} (0.008)	0.0950 ^{***} (0.006)	0.0583 ^{***} (0.009)	0.0871 ^{***} (0.007)	0.0819 ^{***} (0.008)	0.0556 ^{***} (0.003)	0.0326 ^{***} (0.002)	0.0516 ^{***} (0.004)
<i>aunum</i>	0.0192 (0.039)	0.112 ^{***} (0.029)	0.0609 ^{***} (0.016)	0.0640 ^{***} (0.018)	0.0408 [*] (0.023)	0.0846 ^{***} (0.017)	0.0608 ^{***} (0.009)	0.0622 ^{***} (0.010)
<i>leading</i>	0.0184 (0.074)	0.0206 (0.074)	0.119 ^{**} (0.053)	0.0648 (0.041)	-0.0553 (0.060)	-0.0464 (0.054)	0.0599 (0.039)	-0.00276 (0.032)
<i>yrend</i>	-0.143 ^{***}	-0.138 ^{***}	-0.292 ^{***}	-0.188 ^{***}	0.00979	-0.0410	-0.190 ^{***}	-0.0722 ^{***}

	(0.050)	(0.049)	(0.051)	(0.030)	(0.028)	(0.034)	(0.031)	(0.020)
<i>time</i>	0.213***	0.154***	0.342***	0.776***	-0.0797***	0.0930***	0.151***	0.489***
	(0.015)	(0.009)	(0.006)	(0.021)	(0.014)	(0.005)	(0.002)	(0.012)
期刊*年份	含	含	含	含	含	含	含	含
<i>N</i>	6286	6354	5807	18447	6476	6470	6110	19056
调整R ²	0.280	0.267	0.330	0.338	0.415	0.438	0.522	0.504

（三）编辑部在主动选择更好的论文吗

在解释英文经济学期刊当中的“关系稿”引用率为何更高时，Laband and Piette (1994a)、Medoff (2003)、Brogaard *et al.* (2014) 等都提到了信息优势假说，即期刊编辑对同单位或其他有关联的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更加了解，更有把握，因此录用的“关系稿”反而比其他非“关系稿”有更高的引用率。由于我们在上文的统计分析中，发现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关系稿”引用率要比其他非“关系稿”低，因而无法识别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编辑部在录用本单位研究人员的论文时，是否存在主动寻找更高质量论文的动机，还是单纯地因为人情关系而降低了对本单位研究人员论文的审核标准。不过，我们可以对比分析各年份高引用率论文和低引用率论文中的“关系稿”比例，来对此问题做初步的探讨。实际上，Laband and Piette (1994a)也做过类似的分析，他们发现，虽然总体而言，“关系稿”有更高的引用率，但在引用率较低的论文当中，“关系稿”的比例又非常高，编辑部主动寻找更高质量的论文存在一定的代价。

具体而言，我们对比分析历年引用率排名前 25%的论文中的“关系稿”比例、引用率排名后 25%的论文中的“关系稿”比例，以及全部该年论文的“关系稿”比例。如果引用率前 25%的论文中的“关系稿”比例显著高于总的“关系稿”比例，说明期刊编辑部确实在主动寻找更好的论文，只不过其附带成本较高而已。同时，如果引用率最低 25%论文中的“关系稿”比例显著高于总的“关系稿”比例，说明该期刊确实对本单位研究人员降低了录用门槛，使得一些低质量的论文发表出来。从图 8 中，我们可以看出，引用率较高的论文中，“关系稿”的比例低于总样本“关系稿”比例，而引用率低的论文中，“关系稿”的比例又高于总样本“关系稿”比例。这似乎可以说明，期刊编辑部录用本单位研究人员的论文，并不是基于对本单位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更加熟悉，而更大的可能性是降低了对本单位研究人员论文的录用标准。当然，从历年数据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引用率论文和低引用率论文中的“关系稿”比例有趋同的趋势，这也是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更加规范化的一个不太明显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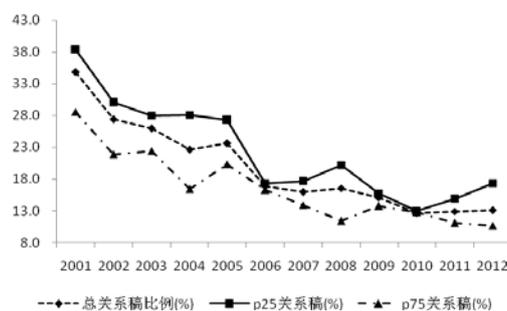


图 8 不同年份不同引用率等级的“关系稿”比例

七、结论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不仅能够彰显中国经济学界学术水平的不断提升，而且可以通过更为严谨规范的分析直接为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提供建设性意见。而经济学研究的进步离不开经济学期刊的引导与支持。经济学权威期刊规范化、公平化管理是中国经济学学术进步

的重要保障。期刊编辑部如果偏爱某一机构和部分群体,可能会严重损害中国经济学的学术进步。本文通过对 2001 年至 2012 年 12 种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上发表的 19000 多篇学术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经济学期刊编辑部会偏爱该期刊隶属单位研究人员,产生大量“关系稿”。而“关系稿”的引用率会显著低于非“关系稿”,“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现象明显。同时,进一步回归结果表明“关系稿”的贴水现象有所缓解,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规范化、公平化有所进步。

很显然,有一些因素可能影响到“关系稿”的引用率,而我们却没有考虑。比如作者个人特征、作者之前论文的引用率、论文研究方法等肯定会影响论文引用率,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这些因素我们均没有考虑在内。而同时这些因素对引用率的影响可能又不是独立于“关系稿”,从而缺失他们可能对“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程度估计造成影响。此外,考虑到期刊代表性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仅以《经济研究》等12种经济学权威期刊为例提供“关系稿”引用率贴水的经验证据,但“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现象是否也存在于其他一般期刊,则仍有待于进一步严格检验。

参考文献

- [1] Azar, O. H., “The Review Process in Economics: Is It too Fast?”,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05, 72(2), 482-491.
- [2] Azar, O. H., “Why Pay Extra? Tipping and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Norms and Feeling in Economic Theory”,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7, 36(2), 250-265.
- [3] Blank, R. M., “The Effects of Double-blind Versus Single-blind Reviewing: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1, 81(5), 1041-1067.
- [4] Brogaard, J., E. Engelberg, and C.A. Parsons, “Networks and Productivity: Causal Evidence from Editor Rotations”, *Journal of Finance Economics*, 2014, 111(1), 251-270.
- [5] Card, D., and S. Della Vigna, “Revealed Preferences for Journals: Evidence from Page Limits”, NBER Working Paper 18663, 2012.
- [6] Card, D., and S. Della Vigna, “Nine Facts about Top Journal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3, 51(1), 144-161.
- [7] 成九雁、秦建华, “计量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对《经济研究》1979-2004 年刊载论文的统计分析”, 《经济研究》, 2005 年第 4 期, 第 116-122 页。
- [8] Coats, A. J. S., “Top of the Charts: Download Versus Cit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 2005, 105(2), 123-125.
- [9] Coats, A. J. S., “The Top Papers by Download and Citat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 in 200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 2008, 131(1), 1-3.
- [10] Coelho, P. R. P., J. E. McClure, and P. J. Reilly, “An Investigation of Editorial Favoritism in the AER”,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014, 40(2), 274-281.
- [11] Costa Vieira, P. C., “Statistical Variability of Top Ranking Economics Journals Impact”,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04, 11(15), 945-948.
- [12] Costa Vieira, P. C., “An Economics Journals' Ranking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Number of Pages and Co-authors”, *Applied Economics*, 2008, 40(7), 853-861.
- [13] Coupé, T., V. Ginsburgh, and A. Noury, “Are Leading Papers of Better Quality?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10, 62(1), 1-11.
- [14] Ellison, G., “The Slowdown of the Economics Publishing Proces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 110, 947-993.
- [15] Ellison, G., “How Does the Market Use Citation Data? The Hirsch Index in Economics”, NBER Working

Paper 16419, 2010.

- [16] Ellison, G., “Is Peer Review in Decline?”, *Economic Inquiry*, 2011, 43(3), 635-657.
- [17] Engers, M., and J. S. Gans, “Why Referees Are not Paid (Enoug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5), 1341-1349.
- [18] Fölster, S., “The Perils of Peer Review in Economics and Other Science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995, 5(1), 43-57.
- [19] Gerrity, D. M., and R. B. McKenzie, “The Ranking of Southern Economics Departments: New Criterion and Further Evidenc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978, 45, 608-614.
- [20] Hamermesh, D. S., “Facts and Myths about Refere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4, 8(1), 153-164.
- [21] Hamermesh, D. S., and G. A. Pfann, “Markets for Reputation: Evidence on Quality and Quantity in Academe”, NBER Working Paper 15527, 2009.
- [22] Hamermesh, D. S., “Six Decades of Top Economics Publishing: Who and Ho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3, 51(1), 162-72.
- [23] Hirsch, J. E., “An Index to Quantify an Individual’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5, 102(46), 16569-16572.
- [24] Kalaitzidakis, P., T. P. Mamuneas, and T. Stengos, “The Rankings of Academic Journal and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3, 1, 1346-1366.
- [25] Laband, D. N., “Publishing Favoritism: A Critique of Department Rankings Based on Quantitative Publishing Performance”, *Southern Economics Journal*, 1985, 52(2), 510-515.
- [26] Laband, D. N., “Is There Value-added from the Review Process in Economics?: 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Autho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 105(2), 341-352.
- [27] Laband, D. N., and M. J. Piette, “Favoritism Versus Search Good Papers: Empirical Evidence Regarding the Behavior of Journal Editor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a, 102 (1), 194- 203.
- [28] Laband, D. N., and M. J. Piette, “The Relative Impact of Economics Journals: 1970– 1990”,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b, 32 (2), 640–666.
- [29] Laband, D. N., R. D. Tollison, and G. Karahan, “Quality Control in Economics”, *Kyklos*, 2002, 55(3), 315-334.
- [30] 赖平耀, “基于学术期刊文章的数值科研评估”, 《世界经济》, 2011 年第 7 期, 第 131-147 页。
- [31] 兰甲云, “论责任编辑在专家匿名审稿制中的主导作用”,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4 期, 第 126-128 页。
- [32] Leslie, D., “Are Delays in Academic Publishing Necessa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1), 407-413.
- [33] Liebowitz, S. J., and J. P. Palmer, “Assessing the Relative Impacts of Economics Journal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84, 22(1), 77-88.
- [34] 林毅夫, “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 《经济研究》, 1995 年第 10 期, 第 13-17 页。
- [35] 刘瑞明、赵仁杰, “匿名审稿制度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学进步吗?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研究”, 2014 年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入选论文。
- [36] 马超, “年底发表的文章会遭受‘影响力陷阱’”, 《世界经济文汇》, 2014 年第 1 期, 第 1-14 页。
- [37] Medoff, M. H., “Editorial Favoritism in Economic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03, 70(2), 425–434.
- [38] Palacios-Huerta, I., and O. Volij,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ectual Influence”, *Econometrica*, 2004, 72(3), 963–977.
- [39] Quandt, R. E., “Some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s Journal Litera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6, 84(4), 741-756.

- [40] Sauer, R. D., “Estimates of the Returns to Quality and Coauthorship in Economic Acade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8, 96(4), 855-866.
- [41] Smart, S., and J. Waldfogel, “A Citation-Based Test for Discrimination at Economics and Finance Journals”, NBER Working Paper 5460, 1996.
- [42] Stigler, G. J., and C. Friedland, “The Citation Practices of Doctorate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5, 83(3), 477-507.
- [43] Stigler, G. J., S. M. Stigler, and C. Friedland, “The Journals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103(2), 331-359.
- [44] 王军, “中国经济学学术期刊的评价”, 《世界经济》, 2010 年第 12 期, 第 119-153 页。
- [45] Wu, S., “Recent Publishing Trends at the AER, JPE and QJE”,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07, 14(1), 59-63.
- [46] 郇志坚, “近年来我国金融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及进展——《金融研究》2005~2009 年论文及作者和引文的统计分析”, 《金融研究》, 2010 年第 7 期, 第 194-206 页。
- [47] 叶初升、邹欣、张洪涛, “经济与经济学双重转型中的学术期刊发展——以《经济评论》为例”, 《经济评论》, 2010 年第 6 期, 第 6-21 页。
- [48] 于晓华, “中国研究结构发表经济学英文论文的一个统计研究 (1998-2007)”, 《经济学 (季刊)》, 2008 年第 4 期, 第 1477-1490 页。
- [49] 张成思、陈曦, “中国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分析”, 《世界经济》, 2014 年第 1 期, 第 120-133 页。